

#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与 塔尔图学派的渊源\*

余红兵

**摘要** 托马斯·西比奥克是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符号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建模系统理论,围绕作为“意义的形式”的模型及其构建方式而展开。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主要是受到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和伊万诺夫的影响,但它与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概念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质的不同。要想透彻理解这个看似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关键符号学理论,就必须认识到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观实际上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尤其需要注意该理论前期阶段与塔尔图学派的渊源,因为这奠定了整个建模系统理论后期发展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西比奥克 洛特曼 塔尔图学派 建模系统理论 模型

DOI:10.16238/j.cnki.rla.2016.04.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beok's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rtu School

Yu Hongbing

**Abstract** Thomas Sebeok wa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t the very core of his semiotic thought is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which unfolds around models as “forms of meaning” and the ways of their construction. Sebeok's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was main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tman and Ivanov, but it was different than the Tartu conception of modeling system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r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is key semiotic theory seemingly tinted with Russian Formalism, one must realize that Sebeok's view of modeling actually underwent two different phases, and particularly needs to not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period and the Tartu School, as this relationship shaped the basic rou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theory in its latter period.

**Keywords** Sebeok; Lotman; Tartu School;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Model

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1920.9.9—2001.12.21)是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理论涉及面异常广泛,涵盖了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文化研究、非语言交际研究以及动物符号行为等多个领域,所有这些最终都汇聚在了他的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之中,成为其符号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而这个核心思想的核心概念,便是西比奥克称为“意义

的形式”(forms of meaning)的“模型”(models)。根据《意义的形式》中的论述,语言符号系统与非语言符号系统中任何要素的意义只以“模型”

---

\*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传播与认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TQC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等级:一等;资助编号:2015M580444]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项目批号:20140901]的阶段性成果。

的形式而出现,包含四类:符号、文本、代码和喻体。<sup>[1](1-3)</sup>换句话说,意义的生成过程就是各类模型或者形式的转换过程。这样一来,某个符号的意义就只能通过另外一种符号而被解释出来,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延伸。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理念,仅仅形成于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的后阶段。

在研究西比奥克建模系统观的时候,西方符号学界往往多倾向于用概括式的方法,并将其视为单次形成的理论。他们基本上都忽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事实,那就是西比奥克建模系统观实际上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也就是两个密切相关、同时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演化阶段。一个是前期阶段,主要围绕塔尔图学派模拟系统观的批判和建模系统的理论基调的打造与夯实,另一个是后期阶段,也就是完整的建模系统理论。两阶段之间的标志性分水岭就是2000年《意义的形式》<sup>[1]</sup>一书的出版。如果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区别,在理解和把握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尤其是建模系统理论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失偏颇,甚至会导致对该理论的误读。在注意到这个区别的前提之下,要想真正理解西比奥克的建模论,还必须要从它与塔尔图学派的理论渊源说起。本文就专门对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的这个前期阶段展开论述。

## 一、两个阶段的区分

首先需要明确该理论发展的两个阶段区分,因为这是全面理解建模系统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西比奥克首次在中论述塔尔图学派“模拟系统”的概念开始,到80年代他提出非言语性初级建模系统、语言(言语)性二级建模系统和文化性三级建模系统的概念框架,再到《意义的形式》跨千禧年的问世,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沉淀,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结构也更加精密。与皮尔士、索绪尔和莫里斯一样,西比奥克主张符号的多元性,这是他的理论主要特色之一。

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单独的符号概念层面上,他在《对符号学说的贡献》一书写道:

“总而言之,尽管符号学一般被视为交际学科的一个分支,而且在今天尤其如此,但是为了获得对符号的合理的整体理解,必须要纳入的标准来自于意指和交际的研究,而且它们也必须也要与动物行为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达成良好的一致。”<sup>[2](141)</sup>

这样的立场也就直接预示了西比奥克符号学的关注点从符号到模型转变。从一开始将符号分成六大类(信号、症候、象似、指示、象征和名称)以期获得整体性的理解,<sup>[2](117-142)</sup>到后来再用模型的概念将符号、文本、代码、喻体等四个人类基本的意义形式包含在内,来分析整个表征体系,<sup>[1](1-3, 20-43)</sup>西比奥克符号学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演变和发展,他的理论也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对整体性、全面性和动态性的强调。

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经了长期不断的积累和反思之后才最终确立下来,公之于世。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该理论在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标志性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尤其是第二模拟系统的批评,初步结合生物符号学家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主体世界”(Umwelt)概念和非语言符号行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对语言是否是第一模拟系统进行批判性探索。第二阶段是完整的建模系统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围绕“建模在生命形式中的功能是什么?”的根本问题,从生物符号学视角展开一种对方法论框架的寻求,这同样也包含了对一系列相应的引申性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类建模与其他物种的建模系统如何相似或不同?建模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sup>[1](v)</sup>等等。西比奥克认为这个方法论框架就是建模系统理论,并将这种理论用于跨物种的建模现象分析称为“诸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或简称为SA)。<sup>[1](1)</sup>

第一阶段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是西比奥克的一篇题为《在什么意义上语言是一个初级建模系统》(In what sense is language a primary modeling system)的论文。这篇论文在西方符号学界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被人们译为法语、

葡萄牙语、汉语、匈牙利语等多种语言发表或收录在各类学术刊物与论文集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比奥克对建模概念的首次论述其实要比这早得多,对此我们可以参考西比奥克专著《对符号学说的贡献》(Sebeok 1976)一书中题为《符号学:现状调查》的文章(Semiotics: A Survey of the State of the Art)。<sup>[2](1-46)</sup>该文在1969-1971年间写成,最早发表在西比奥克编撰的《当代语言学趋势》第12卷。<sup>[3](211-264)</sup>通过这篇文章,西比奥克不仅对当时的符号学研究现状做了清晰全面的批评式梳理,也首次正式地论述了 modeling 的问题。不过,从这篇文章的一些记录中我们能看到:虽然英文名称都是 modeling systems,但西比奥克的 modeling systems (译为建模系统)与塔尔图学派的 modeling systems (译为模拟系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与洛特曼的模拟系统概念作比较时就更加突出。

## 二、在爱沙尼亚的理论接触

1970年8月17日至24日,西比奥克受邀在爱沙尼亚的塔林参加了一次芬兰-乌拉尔研究国际会议(西比奥克本人就是世界知名的芬兰-乌拉尔语言文化专家),巧合的是塔尔图学派的第四届二级模拟系统夏季学习班正好在同一个时间段举办。西比奥克便前往塔尔图参与了此次学习班的讨论,并宣读了自己的论文《符号的结构分类》。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符号分成了六类,包括信号、症候、象似、指示、象征和名称,这种广义的分类法将生物科学与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结合了起来,后来也直接用在第二阶段的建模系统理论中,一同被划归到单性模型的范畴之中。也就是在这一学术活动中,西比奥克会晤了洛特曼、伊万诺夫等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比奥克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模拟系统概念的经典权威定义是由洛特曼在1967年确定的”,<sup>[4](140)</sup>但第二模拟系统的概念事实上却是由塔尔图学派的著名符号学家乌斯宾斯基提出的,<sup>[5](11)</sup>而且伊万诺夫也是塔尔图学派较早提出模拟系统概念的学者,早在1962年他就与扎利兹尼亚

克和托波罗夫一起合作发表了《关于一些符号模拟系统的结构-分类研究的可能》(On the possibility of structural-typological study of some semiotic modeling systems)。

通过对三者的横向对比,我们发现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主要是受到洛特曼和伊万诺夫的影响,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建模系统理论与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符号学界在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时存在着一个概念上的误区,这主要是来源于名称上的阻碍,因为不论是西比奥克的“建模”还是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翻译为英语都是 modeling。西方学界对西比奥克的研究基本都是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倾向于认为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与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讨论的是完全相同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者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处于对立的状态。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两种理论的内容和特征,将西比奥克的 Modeling Systems 译为“建模系统”,或者“模型建构系统”;塔尔图学派的 Modeling Systems 则采用张杰和康澄<sup>[5](11-14)[6](18-22)[7](59)[8](142-143)</sup>的版本,译为“模拟系统”。同时本文也主张建模系统理论与模拟系统概念并无本质上的对立,而是研究的侧重和出发点有所不同,而且二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地方。

洛特曼作为20世纪苏联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是塔尔图学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文化符号学、符号圈、符号系统论等思想为世界符号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极为深远,被誉为“文艺研究中的哥白尼”。<sup>[5](前言:3)</sup>洛特曼在1967年提出这样的模拟系统概念定义:

“模拟系统是一个由元素及元素组合法则组成的结构,它和知识、思考或规则的对象整体处于一种固定的类比状态。因此,模拟系统可以被当作一种语言。以自然语言为基础,获得补充性的超结构从而创造第二层面的语言的系统能够被恰当地称为第二模拟系统。”<sup>[9](7)</sup>

在洛特曼看来,模拟“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活动的结果可以被认同为‘客体的相似物或相似现象’”,简单地说,模拟系统“就是其所有成分结构及其构成规则都是按照‘相似性’原则建构的体系”。<sup>[10](104)</sup>人类自然语言便是在此原

则上建立的第一模拟系统,而文化系统则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第二模拟系统。

伊万诺夫对苏联符号学和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贡献也非常巨大,“他所提出的苏联符号史学思想和信息符号学思想,代表着俄罗斯当代符号学研究的最高水平”,<sup>[10](119)</sup>同时他也是从控制论、信息科学和大脑神经科学等跨学科角度进行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伊万诺夫指出:人类各种符号系统以多种方式模拟世界,“这种模拟要从冯诺依曼式的控制论意义上理解,即世界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机器的被动记忆。模拟的等级区分受制于符号系统S对整体对象W的抽象程度。”<sup>[9](47)</sup>因此具有最高抽象性的数学系统就有最小的模拟能力,而抽象程度较低的宗教符号系统就有着最大的模拟能力。<sup>[9](47)</sup>伊万诺夫所提出的这种基于抽象程度强弱而确定的模拟系统概念与洛特曼的强调类比的模拟系统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学界普遍认为:“‘模拟系统’的概念在苏联符号学中处于中心的位置,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模式”,<sup>[9](7)</sup>“不仅是洛特曼一生从事符号学研究的理论依据,也同样是整个塔尔图学派学术活动的基石。”<sup>[10](104)</sup>尽管如此,索绪尔所主张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模拟系统概念中却并未得到同样的侧重。考虑到塔尔图学派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以及结构主义的关系,这点尤其值得注意。有趣的是,他们对象似性(或相似性)的强调则表现的十分明显。这点与皮尔士和西比奥克的符号理论十分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二人都极为强调符号的象似性。<sup>[11](121-127)</sup>但是西比奥克的建模观超越了这点,他的建模系统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象似的层面。

在《符号学:现状调查》一文中为塔尔图学派模拟系统所做的脚注里面,西比奥克记录了他在塔尔图逗留期间向伊万诺夫等人所提出的自己对 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 的理解,这也是最早版本的西比奥克式建模观:

“二级建模系统(Secundary Modeling System)的概念在广义上指的是世界的意识形态式模型,其中环境与其他某系统如一个生物个体、一个集体、一台电脑等等处于相互的关系

中,这个模型对世界的映像控制着这个系统的整个交际方式。世界的模型因此组成了此个体、集体、机器等等的行为程序,因为它确定了它们的运作选择,以及藏在这些运作下面的法则和动机。世界的模型可以实现于各种形式的人类行为及其产物中,包括语言文本——因此而产生对言语艺术的强调——社会制度,文明迁移,等等。如果我理解得完整,这个概念类似于一些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类学家所持的主题原则——它所带有的艺术性洞见比科学性严谨要多——被称为‘风习’,某一种文化的整合或积总模式。”<sup>[2](23)</sup>

西比奥克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道:“我给他们读了这个段落,作为领袖人物之一和此概念创始人之一的伊万诺夫说道:‘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sup>[12](16)</sup>从这段初步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比奥克在这里所说的模型和建模系统凸显的是一种“程序力”,由世界模型而产生的对生物体(比如人类)的一种规约制导的作用,因此显然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行为事实上也就是文化的行为与结果。<sup>[13](87)</sup>

西比奥克这样的理解有着充分的理据,因为塔尔图的二级模拟系统原本指的就是文化符号体系,而文化对人的行为方式的确起着规约制导的作用。伊万诺夫等人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

“语言与宗教共有的特点关系到它们(比数学系统)较高的模拟能力,这些也导致了这两种作为自动强加于某群体中所有成员的形式程序在使用中的明确相似。具体来说,这种特定的使用在这样的系统和其他模拟系统之间做出了区分,比如某些艺术和科学的语言。当今的语言学已经发展出了分析这些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意识的程序的特定方法,而且似乎也可以将这些方法很有效地用于其他相似种类的符号系统的分析中。”<sup>[9](47-48)</sup>

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说:在西比奥克的这个早期的模型概念中,其实已经隐现了一种“文化牵塑力”的暗示,即文化对此文化中个体的牵引和塑造效应,而从建模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说,文化是处于第三级的建模系统,它的意义组

成要素就作为各类模型。

### 三、另辟蹊径与理论超越

事实上,根据《语言是初级建模系统?》(Language as a Primary Modelling System?)一文的描述我们可以推定:西比奥克从一开始便预知了他所提出的建模观与塔尔图学派的理念会有所不同。他在该文的开始部分便写道:

“尽管在当时伊万诺夫和善地默认了我即兴的构想,在我之后看来,这似乎需要进一步的阐明。相应地,(本书)最后一章的目的就是要聚焦于最卓越的人类建模系统一口头语言。”<sup>[4](139)</sup>

总体而言,相对于塔尔图学派所主张的第二模拟系统,西比奥克从一开始所关注的侧面已经不再是此系统所基于的人类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即第一模拟系统,或者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体系,即“世界模型”。虽然这样一个概念很自然地就让人联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但西比奥克在构建模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掉入先验主体和经验世界的哲学矛盾漩涡中,相反,他绕过了现象学等哲学思辨的泥沼,从乌克斯库尔的生物学理论中找到了模型最初的对应:主体世界(Umwelt)。

在《语言作为初级建模系统》一文中,西比奥克认为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模型:

“Umwelt 这个术语显得极难翻译,尽管‘主观宇宙’、‘现象世界’和‘自我世界’都以不同的程度贴近作者的意图。但是‘模型’能更为精确地将它翻译出来,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信条‘每个主体都是其 Umwelt 的建构者’”<sup>[4](144)</sup>

这就是在建模系统理论第一阶段中西比奥克所给出的模型概念。按照这样的理解,每个生物主体都是生存在自己以物种特有的感知方式所构建的模型之中,因为它们具备了获得外在世界感知的生物能力;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某种盲性,也就是说某物种所拥有的主体世界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可能是部分地或者完全地不能获致。西比奥克进一步指出:

“任何一个生物体的所有行为方式必须

要与其关于‘现实’的模型达成合理的一致,即与其神经系统所能组合起来的符号系统一致——否则它必然会因为自然选择而灭绝。”<sup>[4](145)</sup>

此外,西比奥克还进一步指出,模型既可以是象似性的,即“依靠有效的相似”,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即“依靠一种推加的、约定俗成的、习惯的临近性”。<sup>[4](143)</sup>

因此可以看出,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观与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观对待相似性问题的方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根据西比奥克的查证,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乌克斯库尔的意义理论。<sup>[4](143)</sup>所不同的是塔尔图学派对乌克斯库尔的借鉴还结合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和结构主义、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的理论。虽然和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一样都与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有所关联,但是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还是多倾向于隐喻式的类比应用。而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的本身就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研究,他所开启的生物符号学也体现了更为彻底的跨学科性。<sup>①</sup>

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观与塔尔图学派相对应的理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历时性。塔尔图学派的语言和文艺研究多来自于俄国的形式主义,与索绪尔传统和结构主义有着极为深厚的本源关系,因此他们的模拟系统概念体现了索绪尔所提出的共时性研究方法,这在洛特曼的理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sup>[8](16)</sup>西比奥克对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符号学礼赞有加,但同时对他们所提出的模拟系统概念也做出了本质性的批判。生物符号学的立场使他能够关注一个塔尔图学派所疏于研究的方面:生命体及其符号活动的进化。他这样评论道:

“我认为苏联人的一二模型是不正确的。很明显应该有三个,而不是两个,因为他们将进化史上在语言产生之前所进化出的一切都放在了考虑之外。”<sup>[12](23)</sup>

<sup>①</sup>从《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期刊被 SCI、A&HCI、SSCI 三大检索共同收录的事实可窥见一斑。

通过进一步援引人类进化史的研究发现,以及人类符号活动中非言语方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爱因斯坦和莫扎特等人通过非言语思维而进行理论构思和音乐创作的实例,西比奥克证明了即使在人类演化到如今这样一个常以语言为中心符号体系的时代,非言语符号(模型)在思考过程所起到的作用仍然要比言语的方式来更为自然和直接。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语言只是在人类演化史上相当晚的时期才产生。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将语言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标志,还是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承认语言的晚近性,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语言产生之前确实存在着更长时期的非言语生存状态。

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在主体层面还是在主体间层面,我们其实都是以多模型的方式进行着思考和交际,其中包括了各类非言语式和言语式的模型。而且近些年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在人类交际过程中,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达成,但只有三分之一不到是通过言语的方式达成。<sup>[14] [15]</sup>

#### 四、结语

西比奥克最初的三层建模系统是在结合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也就是西比奥克早期理论中的模型)、批判塔尔图学派模拟系统概念和梳理人类语言进化史以及多元化的符号活动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事实上,西比奥克的三层建模系统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初步成型,包括了非言语的初级建模系统、语言(言语)的二级建模系统和文化的三级建模系统。这种划分为第二阶段建模系统理论打下了总体的理论基调,也指明了主要的发展方向。然而,不论是苏联符号学中的二层模拟系统,还是西比奥克早期的三层建模系统(包括他早期的模型概念),基本都是在宏观的本体层面来描述外在符号系统。毫无疑问,这样的早期理论有着自身的启发意义,至少能够提供一种宽广宏大的方法论视野,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不做纵向的拓展,它也极有可能面临一种空泛的危机。西比奥克具有严谨的科学思维,经过多年

的思考与尝试,他对早期的三层建模系统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模型与建模的概念获得了实质性的深入和细化,从而使该理论的解释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应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阔。

#### 参考文献

- [1] Sebeok, Thomas & Danesi, Marcel.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2] Sebeok, Thomas.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76.
- [3] Sebeok, Thomas. Semiotics: A survey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A]//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2 [C], Ed. Sebeok, Thomas. Hague: Mouton, 1974.
- [4] Sebeok, Thomas.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 [5] 康澄: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 [6] 康澄:洛特曼语言观的嬗变及其意义[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 [7] 张杰、康澄: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析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 [8] 张杰、康澄:结构文艺符号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9] Lucid, Daniel. (Ed.). Semiotics: An Anthology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 赵爱国: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1]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 Sebeok, Thomas. Language: How Primary a Modeling System? [A]// Semiotics 1987 [C], Ed. Deely, Joh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 [13] 余红兵:文化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遗忘机制[J]//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3期。
- [14] Hogan, Kevin & Stubbs, Ron. Can't get Through 8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M], Grenta, LA: Pelican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15] Pease, Barbara & Pease, Pease. The Definitive Book of Body Language [M],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2004.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